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

在娱乐与革命之间

留声机、唱片和上海音乐工业的初期 (1878-1937)

【德】史通文 (Andreas Steen) 著 王维江 吕澍译

上海辞书出版社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

在娱乐与革命之间

留声机、唱片和上海音乐工业的初期 (1878-1937)

【德】史通文 (Andreas Steen) 著 王维江 吕澍 译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音乐工业的初期:1878~1937/(德)史通文著;吕澍、王维江译.
—3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8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Zwischen unterhaltung und revnltion

ISBN 978-7-5326-4348-6

I. ①在… II. ①史… ②吕… ③王… III. ①唱片-出版业-研究-中国-1878~1937 IV. ①G239.295
②J6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6614 号

本书翻译获得“阿胡斯大学研究基金会(Aarhus University Research Foundation)”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创新工程城市史学科”资助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音乐工业的初期(1878—1937)

(德)史通文(Andreas Steen)著,吕澍、王维江译

责任编辑/胡欣轩 特邀编辑/朱菁 装帧设计/姜明

助理编辑/李婉青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37 插页 1 字数 431 000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4348-6/K·999

图字 09-2012-374 号

定价: 89.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66700301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资助项目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编纂委员会

主任

熊月之

编委

(以姓名笔画为序)

马学强 卢汉超 李培德 何一民 宋钻友
张利民 金大陆 承 载 梁元生 熊月之
黎志刚 戴一峰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 Hans Steen(1938—1982)

总 序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城市的出现均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城市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还是近五十年的事。

近代以前,城市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随着 18 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兴起,城市化进程加快。1800 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3%。1900 年上升为 13.6%。2007 年 5 月 23 日,世界城市化率首次超过 50%,也就是说,世界城市人口从此超过了农村人口。

中国在 1949 年的城市化率为 10.6%。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至 2008 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 46%,有 655 座城市,其中百万人以上特大城市 122 座,超大城市 39 座,有 6.07 亿城市人口,地级市以上城市的 GDP 已占全国的 62%。

无论在世界,在中国,城市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地位的日益加重,城市史研究突飞猛进。

在西方,城市史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中国,城市史

开始受到重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于发达国家二十年,但大体上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提速同步。1986 年,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史被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对城市史研究的整体重视。此后,中国城市史研究呈井喷之势,疾速发展,各种城市史论著,包括单体城市研究、城市群研究、不同类型城市比较研究、城市史研究方法研究等,姹紫嫣红,目不暇给。与此相一致,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也快速发展,对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成都、杭州、苏州、扬州、自贡等均有专著出版,其中对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研究成果尤为丰富。

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已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领域,国内外不同学术背景的机构、学者就城市史研究进行学术交流、合作已是常态。前几年,我们选译过一套《海外上海史研究译丛》,凡 12 本,颇受学界重视,但也有诸多遗珠之憾。有鉴于此,我们选译了这套《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意在介绍海外学者在中国城市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就风格而言,这套书是《海外上海史研究译丛》的继续,就范围而言,则是《海外上海史研究译丛》的放大。

翻译本是苦活,加上研究单位在成果考核时,多不给译作计分,这样,此项工作的推进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令人欣慰的是,有一批学者乐于此道,志在学术,甘于奉献。我们相信,此项工作对于繁荣中国城市史研究、提升中国城市史研究水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众擎易举。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同行加入进来!

熊月之

2009 年 10 月 28 日

译者说明

译稿的注释方式参照原文式样:著作只注出作者名、出版年份和页数,完整出版信息见书末文献征引;正文和注释中的缩写如“第3.2.1”表示第3章第2节第3段。档案缩写注释可查“缩略语列表”,如BArch,即表示Bundesarchiv, Berlin(德国国家档案馆,柏林)。部分引文和出处原作者标识在正文中,译稿一仍其旧。

外国人名已有固定中文译名者首次出现在括号内注以原名,后面再出现只写中文译名,无固定中文译名者则依原名照抄。

书中照片为原版书所有,现图片插放位置仍以原版为准。

译文经原作者史通文先生审定,译者对此表示真挚的谢意,但译文中的任何错误都由译者承担。

本书的翻译纳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自始至终得到所里的关注和支持。自2009年开笔,历时四年有余,感谢原作者、上海辞书出版社和熊月之先生的宽容和耐心。葛涛先生详答有关专业词汇及译名,感铭于内。学生李骛哲代为核对部分中文的引文、王亚楷代为翻译了法语句子,一并致谢。

译者谨识

2013年9月16日

中文版前言

中国的留声机历史是中外合作与融合史上引人入胜的一章。本书以 1877 年留声机在美国的发明为开端,追溯其通往中国之路,讲述其登陆上海的历史以及这样一个工业分支的产生过程: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商业为动机,向市场推出了充满吸引力的留声机、唱片、技术以及声音与音乐的结合品。留声机和唱片的特质和魅力,加上运行高效的国际经济组织,让这一工业分支迅速扩张。从狭义而言,由唱片这一媒体而进行的技术交流,迅速转变为文化交流,因为几乎每张外国唱片很快就能在上海买到,之后也能在其他“口岸城市”买到。

出于多种原因,上海一直是唱片工业的中心。上海所具备的条件反映出其半殖民地环境所能提供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国内、国际的声音交流成了那里正在形成中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由此产生的杂交的新声音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所谓的“时代曲”。

上海的音乐工业是大大小小的不断竞争、争吵和合作的国内外唱片公司的集合体。总之,这一工业既处在国际技术发展和贸易的条件之下,也受制于上海的特定条件。换一种说法,其纯粹的商业导向由于内战、反帝运动以及抗日动荡而在上海持续受到挑战并产

生嬗变。从这个角度看,这无疑一方面导致了唱片的工具化,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唱片的文化和政治价值,因此也就有了本书的书名:“在娱乐与革命之间”。本书结束于1937年夏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这是中国唱片历史的重要转折。

本书运用了各种不同的理论来展现唱片特别重要的影响力,或者说这些理论用以充分展示唱片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中的深刻渗透力和“网络结成”。当然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描绘出各种各样参与其中的公司、机构和人员及其决策、动机和局限性。上海的乐声因此作为不同文化的交流成果以及经济、政治利益而能够令人领会,它们部分地互相补充,也互相冲突,先后或同时反映并构建了那些年上海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处境。本书尝试找出其中的相互关联,并展示这一新媒体在民国时期上海的广泛意义。

我很兴奋,本书现在也能与中国读者见面。同时我要坦承,本书还未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在娱乐与革命之间”首先以1997—2003年的调查研究为基础,那时在中国还几乎没有人对留声机进行科学的研究。本书于2006年以德文出版。从那时起发生了很多事,我高兴地发现,“我钟情的爱好”如今在中国也成了音乐史学者和音乐研究者广泛搜集资料并乐于交换成果的领域,并成为媒体“出镜率”较高的领域。

目前,从不同角度对留声机所做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已经出版,可惜我来不及将其吸纳到本书之中。尽管如此,我依然相信,因为视角、理论基础以及所使用的外国文献,本书会给读者带来很多新的见解。

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支持,中文版的出版是不可能的。我特别要

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熊月之教授,他首先提议翻译本书,从本项目伊始就给予支持,并持续予以关注。我必须感谢“Aarhus University Research Foundation”给予翻译工作的大力支持。另外还要感谢王刚,他以其丰富的知识,给予我很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最后,我更要感谢本书的译者吕澍、王维江,其辛苦自不待言。他们不知疲倦地与那么多复杂的德国语法“战斗”,才使得中文版得以问世。

史通文(Andreas Steen)

2013年4月于丹麦 Aarhus

目录

译者说明	1
总序	1
中文版前言	1
 导言：上海与音乐工业	 1
 第一章 声音的扩展：外交、探险和中国首张唱片的 生产(1878—1906)	 33
一、蜡筒留声机在中国：洋物与科学(1878—1900)	35
1. 蜡筒留声机和留声机	35
2. 外交关系以及蜡筒留声机的“发现”	38
3. 留声机进入中国并被接受	42
二、通往中国之路：第一个商业录音(1903—1906)	53
1. 爱迪生：美国的中国录音	56
2. 盖斯伯格为留声机公司所做的亚洲之旅	62
3. 德国：“蓓开录音大探险”	67
 第二章 在上海的开端：现代化实验室中的唱片 工业(1903—1919)	 86
一、文化领域里的留声机	90
1. 外国集团公司和文化分隔	91

2. 中国对外国音乐的接受	95
3. 娱乐明星(一):京剧的传统	98
4. 娱乐明星们(二):现代“花界”	108
5. 留声机的实际应用	114
二、上海的国际性唱片工业组织	124
1. “四万万顾客”:唱片贸易和竞争	125
2. 胜利留声机和谋得利公司	130
3. 哥伦比亚公司和乌利文公司(Ullmann & Co.)	135
4. 东方百代(Pathé Orient)	138
三、筛选出的演员、录音和造假	144
1. 谭鑫培:唱片、冒牌货和“鸡和狗的斗争”	145
2. 从茶园到舞台:叫座的歌女	155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161
1. 战争损害和新的可能性	162
2. 民族主义的抵制与“新文化”	164
3. 来自日本的竞争	166

第三章 内战期间的音乐工业:民族利益与商业

享受(1919—1927)	193
一、租界里的抗议和享乐	197
1. 民族主义和革命	198
2. 消费:外国唱片、电影和广播	209
3. 上海的移民及其音乐文化	224
二、上海唱片的生产和销售(I)	229
1. “东方百代”的时代	231
2. 进口业务、胜利、哥伦比亚和高亭	234
3. 大中华唱片公司	242
4. 上海留声机生产的开端	245

三、20 年代唱片的内容	249
1. 流行歌曲和歌词	251
2. 梅兰芳:从舞台艺术到唱片明星	259
3. 黎锦晖:通往现代“时代曲”的道路	266

第四章 上海唱片工业的繁荣时期:在娱乐与革命 之间(1927—1937) 294

一、唱片的权威与控制	299
1. 郭沫若:“当一个留声机器!”(1928)	300
2. 教育上的要求和唱片的权威	305
3. 在民族音乐文化辩论中的“古典唱片”	314
4. 进口的娱乐:爵士乐和跳舞音乐	320
5. 南京政府的唱片审查	332
二、上海的唱片生产和销售(II)	340
1. 进口业务:留声机、唱片和收音机	343
2. 唱片生产公司	348
3. 中国:大中华、新月和长城	352
4. 德国:高亭、蓓开、歌兰摩风(Grammophon)和 宝利(Polydor)	361
5. 美国:开明和胜利	368
6. 英国:百代公司	374
三、唱片消费和市场秩序	391
1. 唱片目录	392
2. 唱片广告和“预设”中的消费者	400
3. 上海唱片贸易的地理分布	409
4. 广播和版权	413
四、唱片:娱乐和民族抵抗	417
1. 梅兰芳和“四大名旦”	420

2. 黎锦晖和“时代曲”	428
3. 电影歌曲和电影中的唱片	442
五、中国唱片的民族与政治界限	472
1. 百代公司：为民国政府所做的“教育唱片”	472
2. 唱片工业的国际审查	478
3. 从上海到延安：留声机和中国共产党	487
结语	492
第五章 结束语：上海的乐声	518
附录	534
参考文献	537
缩略语列表	573

导言：上海与音乐工业

很多西方发明在 19 世纪末就已来到中国，其中就有录音技术。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 1847—1931)在 1877 年 12 月向公众展示了他的留声机。尽管初时被当作玩具受到嘲笑，但它很快就开始了胜利之旅，将国际文化产品引入新时代。声音刻录下来的可能以及“说话机器”到处都引起好奇、惊异和热烈追捧，这在中国也一样。1878 年，中国第一位驻英国公使郭嵩焘(1818—1891)在伦敦将见到这个机器的情况写进日记里。爱迪生于 1890 年托人把一台留声机带给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李鸿章(1823—1901)，他非常喜欢，立即邀请爱迪生来华，可惜爱迪生没有接受。而此时留声机也被卷入技术改革与国家现代化的科学论战之中，中国新闻媒体对此物的了解也愈加深入。第一次中文录音是在世纪之交的美国唐人街以及伦敦、巴黎进行，1903 年在上海和香港也进行了录音。由此开启了中国与全球文化工业机构的直接联系，其产品——留声机和唱片——首先在那些享有治外法权的城市销售。与电影一样，声音、话语和音乐都成为世界性的新体验，它们在中国也使得扩展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成为可能。

本文所涉及的时代，覆盖了录音技术的最初六十年，即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甲子，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直至 1937 年经由西方列强“非正式帝国主义”¹实施的中国工业化的开始阶段。中国在这一时期从帝国走入民国，该民国在 19 世纪 20 年代的内战中几乎分崩离析，在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背景下，

中国试图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进行现代化。这一形势决定了唱片贸易的基本架构——生产、消费都在上海,它是中国音乐工业的中心。尽管这一工业分支在民国时期(1912—1949)遭受了很多打击,唱片业还是发展成为这一时代在上海最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介。留声机不仅承担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功能:它既是娱乐的工具,也是教育或宣传的媒介,同时它还陪伴着、促进着音乐和文化上的嬗变,几乎没有任何一种音乐形态可以避免这样的嬗变。因为这一嬗变的多样性和适用性,193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也反映在这一行业的生产过程及其内容上。

西方和中国学界至今尚未对上海音乐工业的开初阶段的组织和结构进行过研究。本文着眼于清代(1644—1911)和民国的历史关联,对中国的早期唱片历史首次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本文的出发点是研究中国唱片在京剧和爵士乐之间、电影和广播之间、革命和娱乐之间所展现出的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作用。兼顾各种不同的来源——唱片的内容、生产的各环节以及参与此工业分支开创与发展的人物。这一研究不仅仅着眼于一个特定的音乐风格,而是力图挖掘出这一时期唱片的整体社会意义。通过此项研究,可以使在“上海”研究中的“现代品种”不再被过高估计——这里指的是那些舶来的娱乐样式,诸如电影、爵士乐、赛马和交际舞等。唱片当然有利于西方音乐的输入和产生新的混合的音乐样式,更因其风靡一时,在很大程度上为保存、传播传统和地方音乐提供了可能性。

还应该注意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民国时期各式各样的录音带又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售货架上。使之成为可能的是文化方面的开放和邓小平在1992年发出的上海现代化的倡议。经济上的起飞带来了上海的怀旧风,此风波及香港和台湾,怀旧也带